

创生与成长

——中国工会的红色足迹（十二）

□关明

在上海期间，徐梅坤奉命组织了中共第一个秘密特工小组，专门惩治工贼及叛徒。他们从外滩的洋水兵那里买来了4支手枪，加上几柄斧头作为武器。此后这个特工小组被周恩来改建成“红队”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特科。

1926年，上海区委组织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，指挥部成员有罗亦农、赵世炎、汪寿华、李泊之、徐梅坤、奚佐尧等6人。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，徐梅坤担任南市区总指挥，指挥工人英勇战斗，起义取得了胜利。

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徐梅坤护送周恩来来到长江码头，登上英商“怡和”号轮船离沪。在返回上海路过萧山时被叛徒、沈玄庐的太太王华芬发现告密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。起初判为死刑，后由蔡元培出面营救，才改判无期徒刑。再通过邵力子说情，被判处10年徒刑。1935年9月因病重被保释出狱，后改名徐行之，与组织失去了联系。

1981年，他在耄耋之年再度重新入党，成为党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Part3. 奠基 1922

同心干，唤起工农千百万

——第一次劳动大会，工人阶级走向联合

1922年是中国工人运动首次蓬勃开展的一年，同时也是中国工会组织广泛发展的一年，因而这一年被称为“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”。在这一年中，地方和产业工会的兴起，为全国总工会的成立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13. 林伟民筹建海员工会 苏兆征领导罢工斗争（上）

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开始，到1923年2月结束，历时1年零1个月。其间全国各地共发生罢工100多次，参加罢工工人30多万。

这些罢工就地域而言，集中在上海、湖南、武汉、广东等地；就产业而言，集中在海员、煤矿、铁路等行业。这是因为上述地区和行业，都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，其中以海员工人运动最为著名。海员和华侨一样，前身大都是破了产的农民或失业工人，他们不得已离乡背井，远涉重洋，到外国谋生，或当海员、或当苦工，也有不少人是“卖猪仔”而去南洋或美国的。早期中国海员工人共约15万人，主要聚居于香港，分布在海内外各条航线。

表面上看来海员走南闯北，游历各国，很是风光，然而他们头上顶着三重压力：一是低工资，二是包工制（粤语称为“洗马沙”），三是不平等。另一方面，海员群体又是先进思想最早的接受者，革命觉悟较高。海员长年漂泊于海上，行走于各国，对世界的形势了解较多。孙中山先生在宣传革命期间，经常乘船往来海外各地，与海员有了密切关系。一部份海员受到影响，参加了同盟会，林伟民、苏兆征都是同盟会会员。孙中山在旅途中经常被密探跟踪暗算，幸得海员的全力保护方得脱险。

孙中山向海员说：“自由是可以争取的。商人有商会，你们为什么不成立工会呢？”他的一番话，启发了海员的阶级觉悟和团结意识。1921年3月6日，“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”在香港正式成立。这个会名是孙中山起的，招牌也是他亲题的。会上推选陈炳生

为会长，领导人物还有林伟民、苏兆征、翟汉奇等。林伟民，原名林兴，1887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，自幼随父垦荒种地，下海捕鱼，稍长到香港谋生，在外国轮船上当苦力。结识孙中山后，受其思想影响，积极参加革命活动，为革命党人传递信息、筹集经费、运送军火，支援武装起义。苏兆征，原名苏吉，幼时因为家境困窘，辍学务农。1903年去香港，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海员工人。1908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，积极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物价飞涨，香港比中国其他商埠更甚。由于香港的日用必需物品多由外埠输入，所以物价更为昂贵，工人生计艰难。为了应付当年这“CPI”的上涨，资方对外国海员照顾有加，1921年给外国海员工资增加15%，相反，对中国海员却视而不见，工资分文未增，中国海员心中早有不平。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后，多次向资方提出加薪要求，资方置若罔闻。海员工会忍无可忍，遂决定发动罢工。

工会一声号令，由苏兆征所在的“泽生”号开始发难，香港开往广东内地的轮船以及到港的英、荷、法、日、美各国的海洋轮船，一致停驶。

港英当局闻讯大吃一惊，他们原以为工会不过像往常那样，说说而已，没有想到这回是来真的，一时有些慌了手脚，当晚便派华民政务司（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官员）夏理德到海员工会，用威胁的口吻“劝告”叫海员回船，说：“本港政府是不允许罢工的，你们先上工，工资将来慢慢商量。你们罢工了，不怕饿肚子吗？”苏兆征对夏理德说：“我们的要求已经提过三次了，一直未见答复。这一次若不答应我们的要求，决不上工。”

按照海员工会的安排，罢工海员陆续返回广州。形势很快影响到新加坡、汕头、上海等口岸，有些船靠岸便停驶，有些船在半路便罢工，还有些船根本不敢开来香港。一星期之内，罢工海员已达6500人。

罢工的威力很快显示出来。由于罢工海员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，香港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越来越困难。港府觉得失了面子，恼羞成怒。1922年2月1日，香港总督以“危及治安”为名，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，下令解散，并查封了海员工会的办公地点，抢走了文件、账簿，收走了海员工会的牌子。这下更加引

发群情激愤，全港发生大规模同情罢工，厨师、家仆、面包匠、饼干店工人、办公室工役、运送夫役、电车工人、人力车夫、渡轮工人、银行职员、报馆雇员、印刷工人纷纷加入罢工行列。这一来，“饿肚子”的不是海员工人，反而成了港府的洋大人们。有报道称：“香港工业完全停滞，餐馆经理躬自烹调，英籍官员自任打扫官舍之劳，内河轮船完全停驶，香港与内地交易完全断绝，食品既因罢工暂停进口，香港物价骤涨。港埠中外商店，大都不能全开，银行虽仍营业，而门廊之内皆以武装义勇队守卫，其他店肆亦照常开业，惟华人店员一部缺勤，且几全无交易。”

港英当局原以为工人饥寒交迫，坚持不了多久。现在看到罢工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开始沉不住气了，不得不设法出面调停。香港当局先是找到华工总会，调停无果而终。随后，香港当局政府又让东华医院用“全港街坊”名义出面调停。绅士们说：“恢复工会可以，但要改变招牌，添多或减少几个字。因为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，你们是知道的，这是政府的威信所在。”苏兆征心想，这工会名称是孙中山先生给起的，牌子由孙中山亲自题写，也是我们海员工会的威信所在，岂能容得他们随意改变，坚持说：“工会招牌——‘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’一字也不能增，一字也不能减，而且要给还原有招牌。”

14. 林伟民筹建海员工会 苏兆征领导罢工斗争（下）

调停失败后，双方都在蓄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中国共产党站出来了。2月9日，中共广东支部发出《敬告罢工海员》的传单——

“最亲爱的海员同志们！我们为争生存而举行这次大罢工，凡是有良心、好和平的人们，除资本家及帮助他们的走狗——官僚军阀——外，没有不同情于我们的。……

我们最亲爱的海员同志们！我们应该抖擞精神，完成我们的这一次伟大举动。本党以海员同志们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，定当竭其能力，为之后援。海员同志们！快快共同一致的望着我们的目标奋斗，以期得到我们的最大光荣最大胜利啊。”

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香港海员后援会，领导各地工人支援香港海员，李启汉积极联络上海各水手

公所声援香港罢工。上海印刷工会、机器工会、纺织工人会等工会组织也给予支持。天津、上海两处海员工会积极募捐，赴法国劳工会及上海劳动总同盟，也都汇款接济，并拍电报慰问。

1922年2月12日，京汉铁路的列车上，出现了一面白旗，高悬于机车的顶棚之上，迎风招展，浩荡而来，上面写着六个大字“援助香港海员”，署名为“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”。这是长辛店工人发起组织的，他们联络京汉、京奉、陇海、京绥各路铁路工人，发表宣言并捐款援助，陇海路及长辛店工人每人捐助一日工资，汇往广州支援海员罢工，表现了工人的阶级大义。

各地工人的援助，增强了海员工会必胜的信心。回到广州的海员虽然生活艰苦，每日饭食两顿，每顿一毛。时值隆冬，只发棉衣一件，后来棉衣买不起，就发给麻包。工人都在地上打铺，又无被盖，冷不过了，只好烧柴火取暖。但大家毫无怨言，互相鼓励着说：“顶硬上，兄弟！米俾人睇小！”（粤语，即“坚持到底，兄弟们，不要给人看轻！”）

香港当局不肯善罢甘休，决意破坏罢工，使出一招“釜底抽薪”之计，港方给包工头桂阿毛发出急电，叫他在上海招募工人，来香港顶替罢工海员的工作。林伟民、苏兆征闻讯后，即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火急电报，请书记部设法阻止上海工人来港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电后，李启汉与均安水手公所朱宝庭、钱孝裕，一方面到桂阿毛家里当面警告，一方面到码头劝阻工人。

此刻，码头上有1000名工人，正准备乘船去香港。朱宝庭大声对他们说道：“弟兄们，你们知道去哪里、做什么吗？香港工人罢工，也是为了我们，加了工钱，大家有份。天下工人是一家，上海工人罢工，香港工人不会来。现在香港海员罢工，我们也不应该去！工人不能坏工人的事！”

这些水手本是失业工人，为了生计所迫才被桂阿毛招募，现在听朱宝庭这么一说，当即有一半改变了主意。剩下的一半走到汕头，越想越觉得朱宝庭的话有理，于是又走了一半，最后到香港的不足300人。这些人到香港后，倒是开走了几只船，但技术不好，在海上发生了危险。香港政府这一新策略又告失败。

随着罢工的旷日持久，海员得到越来越多的帮助和同情，罢工“好像时疫一样，传染得异常迅速”，只要那船上有中国海员，不要工会的命令，他们便自动离船上岸。搞得各地轮船都把香港看得好像疫区一样，不敢开来，或者只在港外稍停便走。到后来，不仅农民工人，甚至小商人和土匪也起来帮助了，在工人纠察队封锁之下，一棵菜、一粒米都不能到香港，香港粮食更加恐慌。

香港当局一计不成又施一计，指使机器工会（香港政府御用工会），向工人宣传说：“海员罢工势成骑虎下不得背，我们应该援助他们下背。我们可组织‘全港工人调停海员罢工会’来援助他们，这才是实际。”

海员工会得此消息后召集大会，发表宣言：“我们工人若同情就加入罢工，不能说什么调停。调停就是妥协。”大会一致决议不受调停，要香港工人切勿组织调停机关。此消息传到香港后，香港工人很快取消调停会，并将调停会的招牌和印信打得粉碎。

香港当局见这一招又不灵，立刻撕下面具，露出了爪牙。宣布戒严令，把中国各口岸所有的英国军舰调集香港，禁止火车通行，加岗巡查街道，香港一时变成战时状态。当十余万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时，行到沙田地方，英国军警禁止工人通过，并开枪向工人射击，造成工人4人死亡，数百人受伤，酿成著名的“沙田惨案”。

香港政府满以为如此铁血手段可以奏效，谁知反而激起海员工人更加义愤，香港居民也更加同情工人，香港工人更积极扩大同盟罢工以抗议，各业罢工者日众，工商停顿，使香港差点成了“死港”“臭港”。香港当局山穷水尽，无法可施，只好向罢工海员让步。在广州政府调协下，林伟民等代表到香港与船东谈判增加工资，同时与香港当局谈判恢复工会。最后在1922年3月5日达成协议，船东增加工资15%至30%（因不同航线而定），而香港政府则在3月6日发表特别公报，宣布取消海员工会的封禁令，并且在3月7日派出原来摘下工会招牌的警员，把“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”招牌恭恭敬敬地还给海员。当重新挂上工会招牌时，全体海员及香港全市工人都来庆贺，十余万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。在“海员工会万岁”的欢呼声中，招牌徐徐地挂上去，爆竹连天，声震全港。

至此，52天的罢工胜利结束。（未完待续）